

暖评 拔节生长,是最好的纪念

近日,本报推出报道《袁老师,我们来“交卷”了》,讲述杂交水稻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年轻科研工作者们在袁隆平院士毕生深耕的杂交水稻等领域接续攻关的故事。袁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播下的种子从未停止生长。年轻一代科研人员在稻田中拔节成长,不断贡献新的科研成果,“长”成对袁老最好的纪念。

袁老倾注毕生心血推进的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不断刷新亩产纪录;他

念兹在兹的食品安全课题,随着低镉水稻品种的逐步推广落地,让越来越多老百姓端上了“放心碗”;他心心念念的“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也在照进现实,我国杂交水稻在国内累计推广面积达90亿亩,全球已有数十个国家开展杂交水稻的研究和示范种植,国外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近800万公顷。

在这些成果背后,是一批年轻科研人员的接力奋斗。他们接续推进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攻关,推动亩产不断刷新

纪录。他们还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推动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在更多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让中国稻花香飘向更远方。

袁隆平常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他用一生践行“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誓言。他虽然已经离开,但他留下的精神依然激励无数年轻人投身科研事业。他的故事走进了中小学课堂;他“要下田”的叮嘱,刻进广大农业科研人员的日常;“做一粒好种子”成为许多年轻人追求的目标。

科学的道路没有终点,传承的脚步永不停歇。我们纪念袁隆平,要学习科学家扎根田野、求真务实的作风;要传承科学家面向国家需求、勇攀高峰的追求;要发扬科学家胸怀天下、造福人类的格局。

如今,农业科研领域的年轻人们,正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赋能,向着更高产、更优质、更绿色的目标不断迈进。这是对袁隆平最好的告慰。

(《新华每日电讯》)

观察 马路市场既要有“烟火气”又要有“文明味”

□ 赵春莉

随着夏季的到来,马路市场开始在部分城市街道间热闹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群众对此不同的发声。对于经营者而言,是举双手赞成的,尤其是进城农民不用租用场地就有地方销售自产蔬菜。同时,马路市场也满足了部分居民购物便利。但另一方面,占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或人行道,造成车辆通行的拥堵,以及街道环境问题也不容乐观,反对之声亦不绝于耳。

中央文明办明确,自2020年起,在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今年,全国各地进一步落实该政策,强调“柔性执法”与“服务引

导”相结合。从中不难看出,一切以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更符合多维度的民生需求。

如何减少居民出行与个体生计之间的矛盾,既要治标又要治本。在维护市容秩序的同时,既可解决扰民问题,又能满足市民的购物需求,还可为经营者提供了生活出路,平衡好商家经营与市民出行的关系,这就是执法为民、关注民生的最佳体现。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强化联合文明执法体系,推动从“被动管理”向“共治共享”转变。

以借鉴推实践,不失为马路市场开辟出的一条新道路。如深圳、南通、兰州等地已探索出可复制的经验,划分出“严禁区、管控区、疏导区”,并按需配备垃圾桶、照明灯等设备,实现秩序与民生兼顾。还

有以重庆市南川区为例,通过城市小区周边、人行道等区域划分固定点位,采用“定时定点+柔性执法”的模式,规范商贩经营行为,人走地净,始终保持街道整洁,让马路市场不再成为城市的“污点”,而是一座城市的“亮点”。

城市文明建设,既要有“烟火气”,又要有“文明味”。提升马路市场的建设,共建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以马路市场文明为切入点,让每个人能从小小的细节中看到城市的文明创建水平,更能从细节中看到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让我们以马路市场为载体,将我们的美丽家园建设得更加温馨美好,为城市的整体形象“加分”。

声音

复旦副教授硬刚“举报者”不惯着胡搅蛮缠就对了

□ 张子涵

近日,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发现视频称,她因一场直播连麦被家长举报至多个部门。沈教授连日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此事引起公众热议,更引发身为教师的网友纷纷讲述自己“被举报”的经历。

沈教授提到,自己视频下1000多条留言,不乏基层一线教师的委屈与心声。有人说自己被无理家长举报到失眠,有人说为了不惹麻烦只能对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说明明用心教书却被步步紧逼寒透了心……这种心理阴影下,教师如何还能放开手脚教书育人?当教育者被逼成惊弓之鸟,学生、家长、学校谁都不是赢家,最终受损的是教育的未来。

滥用举报权除了影响教师的积极性,还在潜移默化中误导着孩子的价值观。当孩子看到父母动辄举报老师,他们该如何理解“尊师重道”,如何看待规则与沟通?言传身教之下,孩子学到的不是理性沟通、依法依规维权,而是“不合我意就举报”的极端思维,这种家庭教育将对孩子处理问题的方式产生不良的后果。

当然,反对滥用举报权绝不意味着拒绝正常的监督。对于教师确实存在的违规行为或不妥之处,家长有权也有责任通过正规渠道反映。关键在于举报应当是慎重的、有理有据的,绝不应该是情绪化的、随心所欲的。正常的权利一旦被滥用,最终受损的是维权者本身。

当前,教育部门与学校在处理举报问题上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把“有举报”等同于“有问题”。家长举报教师渠道多样,这本是为了方便家长监督、维权,但有关部门往往把“有无举报”“被举报次数”作为考核学校、老师的重要指标,间接助长了部分家长把举报当作“治老师”的手段,哪怕查明举报不实,被举报的教师也难免受到影响。二是面对举报不进行基本的事实核查,而需要被举报的教师自证清白。以沈教授的遭遇为例,尽管学校最终没有处分她,但应对这场举报已消耗了她大量心力。更合理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对于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举报不予受理,如果举报人捏造事实、恶意诬告,还应进一步追究其责任。

教育是多方同心协力的长跑,而非你输我赢的角斗。正确面对举报,还教师一个清朗的教学环境,还教育一片理性的土壤,关乎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热议 情书是写给阿嬷的 更是写给“唐山”的

□ 侯艳宁

五一档黑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豆瓣9.1分的高口碑、超8亿(截至5月22日19时)的票房实现了逆袭。这部以潮汕方言叙述、以侨批为核心载体的作品,让无数观众在泛黄的批信与阿嬷的守望中红了眼眶。

对于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而言,片中出现的回“唐山”或许会引发地理上的误读。在潮汕、闽南乃至全球华人心中,“唐山”不是我们河北的这座工业重镇,而是海外游子对故土中国的深情总称。

理解南洋题材作品的精神内核,首先要理解“唐山”二字的重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闽粤沿海,地狭人稠、民生凋敝,为了生存,千万潮汕青年男子不得不拜别祖先,前往南洋那片未知的“番畔”(潮汕方言对海外异邦的称谓)。

这种拜别是极其悲壮的。在《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的异域重生》一书中,作者白伟权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早期马来半岛的华人墓碑上,立碑者多为叔、兄、弟,而非妻儿。这一细节残酷地揭示了南洋华人的生存真相。

“唐山”成了再也回不去的彼岸,“番畔”则成了埋葬青春的此岸。

在电影《唐山大兄》中,李小龙饰演的郑潮安,在泰国用血性与拳头捍卫底层华工的尊严与生存权。《给阿嬷的情书》则用侨批展现这群人的生存与希望。

“侨批”是银信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在动荡年代,它是连接“番畔”与“唐山”唯一的生命线,也传递着郑木生与叶淑柔深深的思念之情。

但《给阿嬷的情书》中,最令人心动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种基于信与义的承诺。女主角谢南枝用近20年的时光,守护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家庭。她以逝者郑木生的名义月月寄钱去信,即使晚年身患阿尔茨海默病时,她惦念的仍是“寄的咸猪肉好不好吃”。

南洋华人的团结互助与情义也是片中打动人的泪点所在,当个体在异域的苦难中挣扎时,他们发现,积弱的故国是他们在海外受歧视的根源。于是,那份对家庭的承诺,自然流向了同乡、对民族、对国家的担当。

擅长拍传奇剧的郭靖宇监制的南洋三部曲试图完整勾勒这一

精神进化史,特别是用短剧形式呈现的《狮城山海》聚焦上世纪40年代在马六甲河岸一带谋生的华人群体,他们共同抵御外族压迫,为自身权益而斗争。他们最终意识到,只有“唐山”强大了,“番畔”的华人才不是无根的浮萍。

这种升华在《给阿嬷的情书》的结尾也有体现,侨批记载着海外侨胞对祖国每一次进步的狂喜。史料记载,当“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当汕头大学获批筹建,华侨们在批信中流露出的自豪感溢于言表。从寄钱赡养家人,到集资支持革命、支持抗战、支持家乡办学,南洋华人的情义在时代变迁中完成了伟大的跃升。

《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能逆袭成为现象级作品,是因为它在这个数字化、快节奏的时代,重新挖掘出了一种慢且重的情感力量。这不仅是关于个人的命运,更是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

从“唐山”到“番畔”,空间的距离从未缩短,但人心的距离因一封封批信而紧密相连。正如片中所言,这些看似薄薄的信笺,承载的不仅是纸短情长,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坚韧、诚信与担当。